

三十年 战争史

〔德〕 弗里德里希·席勒 著

30
GESCHICHTE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IEGS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三十年战争史

〔德〕弗里德里希·席勒 著

沈国琴 丁建弘 译

丁建弘 校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年战争史/[德]席勒(Schiller, J. C. F.)著;沈国琴,丁建弘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5955-8

I. 三… II. ①席…②沈…③丁… III. 三十年战争(1618~1648) IV. 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091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三十年战争史

[德] 弗里德里希·席勒 著

沈国琴 丁建弘 译

丁建弘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5955-8

2009年7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32

200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0 1/4

定价:35.00元

译者前言

席勒的名字在中国读者中并不陌生，特别是他的名剧《阴谋与爱情》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就已经搬上中国的舞台。但是席勒作为德国伟大的文学家和著名学者（历史学家），他的活动的历史地位，我们却知之甚少。现趁翻译席勒名著《三十年战争史》的机会，根据我们之所学，对此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是德国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同时是一位学者，在德国的文坛上与大文豪歌德(J. W. Goethe, 1749—1832)齐名，被喻为“德国文坛上的双子星”。两人整整十年的合作，谱写了德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华彩乐章”，主创了德意志的古典文学，并使德意志的民族文学决定性地提升为世界的进步文学。德意志民族不仅把席勒视为民族的骄傲，而且是把席勒当作“统一和自由的”象征而加以纪念的。

因此，在具体介绍席勒之前，有必要介绍一点 18 世纪后半叶的德国(称“德意志兰”更为科学)状况，当作席勒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背景。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兰带来极为悲惨的结局，经济的极度凋敝和政治的极度分崩离析(德意志兰分裂为 314 个邦和 1475 个骑士庄园领，均拥有独立的主权，皇权有名无实，盛行诸侯小邦专制主义统治)，在一个世纪后不仅未见改善，有的反而变本加厉了。恩格斯生动地写道：“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胄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

2 三十年战争史

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体的力量都没有。”他接着写道：“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

席勒比歌德小十岁，1759年11月10日生于南部小邦符腾姆贝格公国的内卡河畔马尔巴赫城，一个贫寒的小市民家庭，父亲是公爵部队里的小军官，母亲是小饭店主兼面包师的女儿，一位新教虔敬派的信徒。席勒幼年就受新教牧师的启蒙教育，对语言、歌剧、演戏、牧师说教等倍感兴趣。原想修习神学和语言文学，不期在他14岁时(1773)被卡尔·欧根公爵强制招入他的卡尔军官学校学法学，后来才同意他改学医。卡尔·欧根公爵是小邦诸侯专制主义统治相当典型的代表，专横暴虐，压榨无度。他强迫青年当兵，然后高价卖给英法等国去进行殖民战争。这所由公爵直接治下的军官学校有着“奴隶制造场”的美喻，等级森严，毫无自由，施行残酷的、非人道的训练和监督。然而这种折磨反而触发了羸弱多病的少年席勒那“与生俱来”的反抗精神。这时歌德24岁，风华正茂地投入刚刚兴起的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俨然成为运动的旗手。

简单说来，发生在1770—1785年的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是启蒙运动的继续，比启蒙运动要激进，但只局限于文学领域，也可看成是一场对德国鄙陋社会的文学抗议运动，是由新一代进步的热血青年所发动和担纲的。以个人的力量反抗社会和对于自由的渴望，是“狂飙突进”

的精神表现,这种精神引爆了少年席勒长期积郁在胸的对社会的不平之气。

席勒几乎立刻就被卷入到军校严禁的“狂飙突进”运动中去。军校的铁门根本挡不住卢梭、莎士比亚、歌德和一些“狂飙突进”诗人们作品的传播。年轻进步的心理学家教授阿贝尔把这些作品介绍给席勒,还给席勒文学方面的知识。席勒则憧憬着一种自由的、平等的、博爱的理想——和谐社会制度,正像稍后他的名诗《欢乐颂》中所表达的那样。从1776年起他开始发表一些抒情诗试作,翌年就开始偷偷地写剧本《强盗》,到1780年通过医学考试成为公国首府斯图加特某步兵旅的助理军医后(也就是说在军校“牢笼”中待了整整八年后)的青年席勒,已准备主动“出击”。如果说青年歌德首先是一位感情丰富、富于激情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能把感觉的材料作精美绝伦之升华,青年席勒则属于内热外冷的哲学家型,有一种自觉确定的目标和理想。席勒的激进意识促使他在1781到1784年连续创作了三部民主性的剧本:《强盗》(1782)、《热内亚菲埃斯科的谋叛》(1783)、《阴谋与爱情》(1784),和一部革命性的诗集:《1782年诗选》(1782),加上1787年发表的韵文剧《唐·卡洛斯》,使青年席勒的名声大噪,而且越出国境,俨然步青年歌德之后,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旗手。《强盗》一剧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卡尔,要求用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代替封建专制主义。该剧还对会令人窒息的俗套和高官显臣的腐化作了震撼人心的抗议。1782年《强盗》在普法尔茨选侯领的曼海姆民族剧院上演时取得空前效果,把“狂飙突进”戏剧推到顶点。据一位目击者所记:“剧院几乎成了疯人院,他们圆睁双眼,攥紧拳头,双脚把地板跺得震天响,喉咙都吼哑了!互不相识的人相互拥抱,泣不成声,妇女们踉跄地走向出口处,几乎近于昏厥。那气氛犹如驱散了笼罩在混乱之上的阴霾,露出了一线崭新天地的曙光。”席勒本人却被公爵禁锢起来。写作也被禁止。不久他就逃离了符腾姆贝格公国,到比较开放的帝国城市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一带流浪活动。1784年上演的《阴谋与爱情》取得了真正的

成功。该剧通过宰相之子与平民之女的忠贞爱情未能结合，双双死于小邦专制的强权压力和阴谋陷害，深刻揭露小邦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与黑暗，体现了市民——资产者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社会改革的向往。席勒这部充满叛逆精神的作品，成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这种倾向在稍后的《唐·卡洛斯》中再度表现出来：反对小邦诸侯专制制度，要求一个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理想共和国！正因如此，席勒后来被大革命后的法兰西共和国选为法国荣誉公民（1792）。

“狂飙突进”运动的光辉，到1780年代中期开始消退。深刻的原因恐怕要到德意志兰经济的复苏和许多邦国出现开明君主专制改革中去找。除极少数人还坚持其激进文学立场外，大部分人都开始转向“温和”或浪漫主义。运动的旗帜人物青年歌德和青年席勒都日益感到对改变德国社会现实的无奈，想重新摸索改造德国鄙陋社会的道路。1775年歌德应魏玛大公之邀，任魏玛宫廷枢密顾问，想在这个著名的“开明之邦”通过具体政务和科学研究寻求出路。但是他性格中的双重倾向：同现实小朝廷相妥协和要求自由解放的进步意图，开始形成并激烈冲突，终于过渡到德意志民族文化——德意志古典文学的主创道路。席勒的求索之途则远为艰巨。1785年春，贫病交加中的席勒接受友人克尔纳等之邀，前往文化名城莱比锡观光小住，后又随他们迁居德累斯顿，这期间席勒不仅感到德意志思想界的贫乏，也感到自身的修养和学识的不足，急需学习和研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充电”）。他向往诗人汇集的文艺中心魏玛，那里不仅有歌德，还有文坛耆宿、前辈诗人维兰德和赫尔德尔。1787年席勒来到魏玛，毅然放下文艺写作，一头栽入历史学的学习和研究，进而学习和研究历史哲学与美学（康德为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澄清和认清德意志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疑惑和问题。1788年歌德自意大利归来，两大诗人历史性地会面了。这时作为学者的席勒的历史专著《尼德兰联合体摆脱西班牙的统治》（中文译为《尼德兰独立史》）部分已经初次登台亮相，表现了作者独立自由的反抗精神和人本主义的史学观。他同时还钻研古代文艺，阅读《荷马史

诗》，翻译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写成《希腊的神祇》等诗歌。1789年3月经歌德推荐，席勒就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他的学术就职演说《什么叫做通史研究以及要达到什么结果》，受到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当他1790年开始从事三十年战争史的研究时，他希望在十年之内除了研究历史不再干别的了，并且相信，他会变成完全另外的一个人，完成一些真正通俗易懂的作品。席勒在致友人克尔纳的信中认为，正是历史中的这种任意性才会激发出一种哲学的精神，转而控制着历史；历史的空泛性和无结果性会要求出现一个有创造力的头脑，使历史受孕结果，并在这种构架中置入经络和肌肉；可见从事历史的研究，较之诗艺有无可辩驳的优势。从此信中可以看出，席勒研究历史，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或者为著作而著作，而是为了使历史从一种干枯的知识变成一种激励性的知识，让读者得到激励和欢乐。总起来说，从1787至1795年间，席勒专心致志地用了7—8年时间从事学者生涯，研究历史和历史哲学，写出许多历史和美学著作，除《尼德兰独立史》外，重要的尚有《通史概要》、《三十年战争史》（1792—1793）、《论悲剧艺术》（1793）、《论秀美与庄严》（1793）、《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1795）等，而且明确主张，历史学家的素养至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即哲学的修养，美学艺术的修养，人本主义价值观的修养，通过美育即文艺使人类达到和谐亦即没有矛盾的境界。黑格尔说得很中肯：“席勒钻研的是人类心灵的深处，歌德的兴趣则在于艺术的自然方面。”一个像席勒这样的文学天才，一旦陷入哲学这一无穷尽的抽象之网，虽然也常会显得捉襟见肘和某种狼狽，却也从此中获益匪浅：为重返文学创作的席勒奠定了扎实的哲学—历史—理论基础。“学者生涯”阶段正是席勒“求索”道路上的重要阶段。

1793年席勒创办文艺刊物《季节女神》，后又出版《文艺年鉴》。翌年夏日，歌德对席勒函邀参加《季节女神》表示将“愉快而全心全意地合作”。他们在耶拿自然研究报告会后相晤，订为深交。这两位一直特立独行的德国文坛旗手终于紧密拥抱在一起。歌德显现衰惫的创作精力

经席勒的激荡而又旺盛起来,获得了“第二次青春”;席勒得到歌德的帮助,从康德主义哲学的苦苦探索中摆脱出来,重返诗艺创作之路。两人同样都认识到,文艺创作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或途径,简单说来就是感性的或理性的、自然的或心灵的。1796年席勒在论文中说到:“诗人或者就是自然,或者追寻自然,前者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成为感伤的诗人”。素朴诗人反映现实,感伤诗人表现理想;歌德属于前者,他自己属于后者。席勒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双重性格,即一方面遁入美的王国的抽象领域,一方面却对德国社会和阶级状况作了最高度的现实主义的反映。这和前面说到的歌德创作中的双重性格,实质是完全一致的:祖国的统一和自由要求,是否可以不通过革命的暴力就可以获得,换句话说,是否可以通过教育和改良达到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理想。这是两人亲密结交的真实基础,也是协同创立德意志民族文学——德意志古典文学的真实基础。

从1794年两人订为深交到1805年席勒逝世这整整十年,正是席勒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他的创作思想达到某种现实的思辨理性高度。两人在创作上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各自完成了他们的重要作品,开启了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期。合作主要体现在关于作品的互相讨论、互相提供意见上边。他们之间的互相通信达千余封,是留给德国甚至是人类的一份厚礼。他们各把新的创作精力用在诗艺上。席勒写了许多深邃的哲理诗,并和歌德在《文艺年鉴》上发表许多短小精悍的警句诗,批判当时文艺界和思想界的不合理现象,引起反对者的抨击,两人改写叙事谣曲,以至1797年被称为“叙事谣曲年”。席勒的叙事谣曲如《潜水者》、《手套》、《波吕克拉特的指环》、《伊毕库斯的鹤》以及《人质》、《斗龙记》等,都是对高尚德行如信义、勇敢等的歌颂,情节紧张,格调优美,语言生动,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这个时期席勒最大的文艺成就还是他的戏剧创作,绝大部分是历史剧。1799年,延续了七年之久的席勒的伟大剧本《瓦伦斯坦》三部曲写成。这部历史剧取材于三十年战争史,忠实地描写客观史实,揭露了

大小诸侯的贪得无厌,控诉了战争的罪恶,表达了德国人民要求建立和平统一的国家的愿望。歌德说:“在从事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三部曲的工作时期内,我没有离开过作者。”这部剧本演出的盛况使席勒决心把毕生精力献给舞台。这一年席勒举家迁往魏玛,翻译并改写了许多剧本,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皮卡尔的喜剧《寄生虫》和《侄子当叔父》、拉辛的《菲德拉》;改作中国的《好逑传》、创作了一个哑谜式的中国神话剧本《图兰朵》;排演歌德的《埃格蒙特》,莱辛的《智者纳旦》。

1801年席勒完成一部描写16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女王间矛盾冲突的剧本《玛丽亚·斯图亚特》。同年又完成剧本《奥尔良的姑娘》和名诗《一个新世纪的开始》。1803年,席勒完成模仿希腊悲剧的《墨西哥的新娘》,构成戏剧冲突的是由于不相识的兄妹相爱而产生的兄弟仇杀。席勒要把希腊悲剧的命运观点和合唱队搬上舞台。同年又完成他呕心沥血的作品《威廉·退尔》,它和两年前完成的《奥尔良的姑娘》都是有高度现实意义的爱国剧本,是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外侮(拿破仑战争的入侵)的有力呼声。《奥尔良的姑娘》描写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女英雄贞德的事迹,作者使她通过神力来完成法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部剧本因而被誉为1813—1815年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奏曲。对祖国的统一和对自由的热爱使席勒专注于重大的时代问题,他在《威廉·退尔》一剧中把1307年冬瑞士人民结盟推翻奥皇统治的史实和瑞士民间关于威廉·退尔的英雄传说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出一个反抗异族统治和封建专制统治、进行解放斗争的典型。这部剧本1804年3月在魏玛和莱比锡演出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该剧曾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改编上演)。

虽然这时席勒的声名如日中天(大概仅次于歌德),1802年时还被魏玛大公封为贵族,但席勒依然清贫如故,而且晚年为肺病所累。席勒一生都极为勤奋,1804年在贫病交困中仍开始创作新的剧本《德梅特里乌》,作品反映17世纪初俄国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史实,但只完成两幕,终因沉痾新疾不治,于1805年5月9日病逝于工作室。他建立了

德国的民族戏剧,使其达到世界水平,并对现代戏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那以民族和国家的独立统一为主题的剧本,能引起观众巨大的共鸣,从而成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统一和自由”的象征。席勒遗体于1827年迁葬魏玛陵园,后来歌德也安葬于此,称为“歌德席勒合陵”。

席勒的学者生涯,是以研究历史,特别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为其主体的。虽然他本人曾解嘲似地说,他研究历史是为了使历史从一种干枯的知识变成一种激励性的知识,并让期待的读者们驶向欢乐,实际上席勒的历史研究具有相当深邃的哲理和最明晰的现代性,即与现实和未来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它不是一种影射史学,而是把历史上人类和客观世界的变迁经历看成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整体发展过程,通过理性或曰历史反思清晰地阐述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全部逻辑关系。这种理性或曰历史反思,我们理解,就是席勒的历史思想或历史观,它是作用于历史未来发展的推动力。

究竟席勒的历史观是什么?这是一个远为困难的复杂的研究课题。不少现代研究者指出,席勒显然主张以人本主义为历史的出发点:人的本质是人格,人格的载体是生命,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人的生命体,它是至高无上的,任何政权,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立法,如果侮辱了做人的人格,触犯了人的生命权,那就是历史性的罪人。但是我们理解,仅仅如是说是不够的。席勒的“人本主义”不仅具有外在的生命体和人格的问题,人生而平等和自由,而且具有内在客观人性的善恶美丑变化问题(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实现理想的人性)。问题还有第三方面:据席勒看来,国家代表了公民心中纯粹和客观的人性,借助国家之力个人才能结成为一个整体,当国家站到哲学、美学和科学的中心,而不是站到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一边,就会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说,席勒的历史观,不止是一种外在的人本主义,毋宁说是一种新人文主义,它不仅包含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想(把人放在第一位),人文主义的批判性思潮,反对宗教迷信和经院哲学(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

及人性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张(人具有天生的固定不变的共同本性,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对个性的束缚),而且(需要特别强调的),具有一种德意志式的追求个人自由和国家统一的进步理论和社会主张:他既不赞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也不赞同法国的暴力革命,而是注重道德教养,以高尚的道德境界呼吁人类相亲相爱,实现大同世界。歌德曾说席勒的自由理念,“在青年时代是外在的自由,在晚年则是内在的自由”。席勒的新人文主义的特征是现实经历(经验)与美妙理想(梦想)的奇特结合。他的历史研究并未因其“唯心”性(即所谓“自由理性判断”)而放弃“人性”,看似远离政治,其实紧贴现实;不是纯美学的,而是力求探讨社会改革、社会前进的途径;不赞同革命,并不反对进步;着眼于全人类,向往世界大同。因而他的思想,就远远超出平庸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水平,创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不朽杰作。席勒这种德意志式的历史观,不仅开创了德意志古典历史学(也可看成是德意志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之先河,而且是在寻求实现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的道路。

席勒的历史讲授、历史文章和历史专著,不算宏丰,也不算少,约三大卷之数(在德国 Cotta 出版社世纪版 16 卷本《席勒全集》中相应为 13、14、15 卷),主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研究通史或曰世界史的,宏观上把握世界的总体发展,向往建立一个全新的以人格为基础的世界公民社会;一类是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体制与重要改革的,特别向往古希腊的城邦体制;最重要的一类是研究近代以来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自由和国家要统一的历史趋势,德意志兰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德意志民族的自由和国家的统一,就成了席勒研究的最重头戏,可以说,一部《三十年战争史》,不仅占有席勒历史研究的绝大部分光彩,而且全面体现了席勒开创的新历史研究的进步观。

《三十年战争史》是席勒唯一完成了的历史专著,探讨的就是中世纪末期那场使德国遭受重创的欧洲大冲突中的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用席勒自己的话来说,是探讨“招致外国军队进入(德意志)王国腹地,并使它成为遭受最悲惨破坏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场”的原因。全书共

分五部分(或称五章),没有标题,也没有前言后语,这也许可能是为了回避对政敌过强的刺激。他用最简练的笔触,把这场人类战争史上极其复杂、极其混乱、极其悲惨的欧洲冲突,作了深刻的、透彻的、批判性的描述,不仅使该书成为当时为止最公正、最客观、最为民立言的开创之作,而且直至今日也依然是非常优秀的、进步的经典性名著,对今日的德意志民族教益尤多。在此我们也想把我们认为这部著作中深含寓意和深有教益的历史思想与现实评论作一点体会谈:

第一,席勒是一位德意志爱国主义者,强烈要求德意志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与崛起。当他写完《三十年战争史》不久,他抑制不住大放悲声:“德意志兰?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学术上的德意志兰从何处开始,政治上的德意志兰就在何处结束。”因此整部《三十年战争史》都基于这样的事实背景:德意志兰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是造成德意志民族深重灾难的根本原因。在席勒看来,德国内部诸侯间的宗教战争,欧洲外部国家的入侵和在德意志大地上的横行,新兴的德意志民族成长的困难,根源也无一不在德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可以这样说,凡是有利于德国的统一,包括加强皇权,有利于德意志民族的振兴,包括改革和崛起都会受到席勒的同情、支持和赞赏。当然我们理解席勒的“爱国主义”,爱的是“德意志兰”,“德意志兰”当时的译义,应为“德意志人的故土”或“德意志人的祖国”,政治含义既不等于“德国意志王国”,也不等于“神圣罗马帝国”。

第二,席勒是一位比较激进的新人文主义者,他反对国内皇帝和诸侯的专擅与自私,反对外国入侵者的横行与贪婪侵吞,而同情广大德意志族民,特别是农民和市民的悲惨遭遇,支持他们的反抗努力。三十年战争中大小数百仗,都遭到席勒的谴责,他撕去战争双方神圣的宗教外衣,揭露这些战争都是出于皇帝、诸侯和各国君主的“自私自利目的”和“不可告人的权力欲”,是一场争夺霸权、土地和财富的混乱。但我们同时注意到,席勒在《三十年战争史》中却同情和赞扬波希米亚(捷克)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宗主国的民族起义,同情和支持许多德意志城市居

民保家卫城的英勇抗击行为。席勒几乎通篇都在不断提醒读者，遭到战争双方蹂躏最烈的莫过广大农民，他们真的处在无法生存的地步。他在一处写道：“德意志兰确实到了灭顶之灾的地步。昔日经常云集着欢乐的勤劳人群的地方，昔日大自然曾倾注它最美妙的祝福，和那曾是最繁荣昌盛的地方，现在已是一片荒芜。土地离开了锄犁耕田者勤劳的双手，抛了荒，杂草丛生；在新种刚要结实或已丰收在望的地方，一次行军就使整年的辛劳化为乌有，夺走了憔悴不堪的农民们的最后希望；焚毁的宫殿，荒野的土地，烧成灰烬的村庄，触目皆是，一派家破人亡的景象。”

那么，在席勒这位新人文主义者的笔下，德意志兰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出路何在？席勒在文章中有两处“伏笔”，一处是，“千万张嘴千万次地在祈求和平，即使最有害的和平也被当成是上天的善举”——这就是说，广大人民普遍要求和平的愿望与呼声，终于使战争不再能够继续打下去。这就有点像“人民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原动力”的唯物论原理；另一处是，希望点燃战争之火的大小暴君，认清战争的罪咎，从一名“人类的压迫者、和平的敌人、各族人民的祸根”回归到一名“正义的朋友”。

第三，席勒是一位民族英雄论者，他对英雄的判定标准，乃是此人是否对德意志民族的进步事业起过重大的作用。席勒在《三十年战争史》中，重点研究了三位强势人物：一位是皇帝、哈布斯堡奥地利的君主斐迪南二世，一位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一位是皇帝麾下的统帅、弗里德兰公爵瓦伦斯坦，他们在三十年战争中都曾叱咤风云，不可一世，但都不被席勒认同。他把斐迪南二世称为“较其本性要坏得多的暴君”，作为皇帝却只根据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施行暴力，而从不考虑按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行事。“尽管他具有一名贤明统治者的天赋”，“拥有许多能为民创造幸福的美德”，但他的私利欲和权力欲却使他“从一名正义的朋友变成一名人类的压迫者，和平的敌人和民族的祸根”。当他59岁那年死神把他从战场上招去，他已经来不及“改恶从善”了。席勒对于打着“拯救德意志新教事业”而率大军侵入德意志兰土地的年轻

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是有着某种好感的，特别当古斯塔夫·阿道夫以铁的严明军纪、新的战略技术加上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不仅重创皇帝阵营，一路所向无敌，而且立刻赢得德意志新教等级、城市市民和广大居民的拥护和欢迎，甚至把瑞典国王尊为德意志兰的保护神时，好感更是明显。席勒在文中把古斯塔夫·阿道夫称为“英才”和“雄鹰”，但他提出一个问题：古斯塔夫·阿道夫是德意志人吗？显然不是！那么为什么一个外国的君主带着大军侵入德意志兰的领土呢？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席勒明确答复，瑞典统治者一是要保持德意志国家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打击德意志中央皇权的形成；二是大量掠夺德意志兰丰富的矿藏、财富及至土地。因此当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德意志兰从北到南、从西向东地横冲直撞两年时间后，终于在同重掌军权的瓦伦斯坦“皇家大军”激烈会战中猝然阵亡，“雄鹰在飞翔时，一头栽倒下来”，直到这时为止，瑞典统治者的上述目的表现得尚不清晰，所以德意志兰的广大居民都为瑞典国王的去世而痛惜、而追思。席勒评价说：“瑞典国王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时”，不然的话，他也会“从一个德意志兰的行善者”、“拯救者”蜕变为德意志的压迫者，显然古斯塔夫·阿道夫当然也不能称之为德意志的民族英雄。

对于瓦伦斯坦是否是民族英雄的说法则远为复杂，瓦伦斯坦是一名德意志化了的波希米亚（捷克）贵族（自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德意志人）。具有优秀的统帅能力和勃勃野心，他趁着兵荒马乱、战事纷起的时机，散财拉起一支私家军，经过严格训练，进行投机和冒险。他站到皇帝麾下，不仅挽回皇帝阵营的颓势，而且击败了北方入侵的丹麦军队，把皇帝势力扩张到波罗的海沿岸，被封为弗里德公爵和皇家陆海军统帅，这位卓有军事才能的统帅，深藏着他巨大的政治图谋：一方面他阴谋凭借自己的军队推翻皇帝，自立为王，为此他甚至不惜借外国军队（首先是瑞典军队）来达到目的；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用自己的武力赶走参与战争的外国入侵军队，实现国内和平，使德意志王国成为中央集权的强大的统一国家，这一意愿客观上符合德意志人民的利益，但是他只

是把赶走外国军队、实现国内和平当作他夺权和篡立为王的工具，当这位迷信于星象学的统帅还没有实现他的计划，就被皇帝阵营收买的自己部下的军官所杀，对此席勒后来明确表示，瓦伦斯坦并非民族英雄。他在他创作的名剧《瓦伦斯坦》三部曲中最终放弃了把瓦伦斯坦写成统一德意志的英雄人物的计划。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5
第三章	141
第四章	218
第五章	256
主要国名、地名译名对照	301
主要姓名译名对照	310